

我等就来唱山歌

钟永丰 著





我等就来唱山歌

钟永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等就来唱山歌/钟永丰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321-5921-5

I. ①我…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204 号

责任编辑: 胡远行

封面设计: 朱云雁

插画绘制: 林旭茂

我等就来唱山歌

钟永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9,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21-5/I·4736 定价: 4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目录

辑一

- 3 我的后殖民童年
- 10 我那被摇滚的青春
- 31 我的 Bob Dylan 旅行
- 46 Bob Dylan 与杜甫
- 65 我自身的摇滚乐社会学
- 71 我的辞书旅行

辑二

- 79 下淡水河写着我们的族谱
- 88 水泥的辩证史
- 96 县道 184 之歌
- 112 写首诗给父亲
- 119 转妹家
- 124 重游我庄

辑三

- 131 都市开基祖的临暗
- 150 我的卡哨
- 158 野狼 15、Bruce Springsteen 与荖浓溪的夏天
- 174 失败者回乡
- 181 大水柴
- 187 歌手林生祥

辑四

- 211 导读南台湾
- 216 江湖里的社会学操练
- 221 种树
- 230 试写山歌
- 247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251 历史的弃儿，还是资产？
- 256 菊花为何夜行军
- 260 从农民运动到社造运动
- 275 跋

辑 一



我的后殖民童年

我的后殖民童年记忆的封面，是土砖书房里，二叔听着美国灵魂乐歌手 Otis Redding (1941—1967) 的《Sittin' on The Dock of the Bay》，眯着眼，蹙着眉，嘟着嘴，耸着肩，双手摆胸前，摇着牛仔裤紧裹的屁股，乘着慵懒的拍浪节奏，跳着他自以为称霸舞会的黑人舞步。

大概是抢市场，或反映现代化经济的飞腾，那时翻版唱片色彩大胆。Redding 这首歌收在一堆没什么逻辑的畅销曲杂烩里。从封套里抽出唱片，赫！是红沉沉的颜色，端起来对窗，立刻转成鲜跳的亮红。封面长得奇怪，但我用心地记住了。暑假结束，二叔要坐一整天的火车，回到远远的基隆，念那所被他当成舞蹈专科学校的海洋大学，书房里的电唱机与唱片，就归我专属了。二叔跳舞的样子，他吹嘘的舞会，我没有兴趣，但那唱片一放，哦，立刻有种东西要冲出身体，真像雨后的香蕉园：蚯蚓、蜈蚣，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虫虫，蠢蠢窜动！

1973 年，小学四年级，我不会英文。没关系！那些封面很

好记,都是阿美仔(我们那一带对美国人的称呼)夸张、爱现、沉醉的表情。我迷上摇滚乐团 The Doors 的《Light My Fire》,放牛时哼着歌中的电风琴短旋律给九岁的童年听,牛的踩步变鼓点,天空不再寂寞。后来又发现 José Feliciano(1945—)的翻唱曲,轻灵地把原唱的狂喜塞进好几丈深的阴郁中,像母亲拿手的芋头饭,一口下去,味道有好几层。我心里按着这些新发现的喜悦秘密,无人可讲,如同母亲的心事,她刚腌制的酱菜,只能搁在最内层。

一个学期快得像天空只换几片云。二叔放假回来,顺便就把听腻、不喜欢或不再流行的唱片带回家。他走后我一张一张放,记住有意思的唱片。二叔追流行;有些歌很无聊,譬如《Knock Three Times》,什么敲三下,被黄俊雄布袋戏改成醉弥勒的喝酒歌,还是无聊。有些歌会在心上踩脚印,譬如《House of the Rising Sun》,翻成“日升之屋”。动物合唱团唱红的那个版本,被黄俊雄改成孝女白琴的送葬歌,依然痛肠。披头士的歌当然少不了,那首《Yesterday》真多人改编!最讨厌波尔玛丽亚大乐团的器乐曲版本,轻得像是鹅群赶路时掉下的碎羽毛。

二叔毕业,按学科,应该跑船,但他喜欢有阿美仔的热闹地方。希尔顿饭店刚落脚台北,他跑去应征,一试便中。二叔英文溜,人来疯,擅长即兴表演,头发自然卷,带点暗红,胡须又多,初中便被叫作荷兰人。他也真喜欢这称号;他的自我想象一定是阿美仔,我想,像 Tom Jones 之类的性感流行歌手,随便几首歌,女歌迷就把奶罩、小内裤扔上来的那种。二叔很快干上经理级,听说小费很多,但那时他已不买唱片。

二叔出生那年日本殖民政府退出台湾,韩战爆发第二年他念小学,美国在台湾撑起保护伞。他那一辈是第一批吃美援馒头、啃美援饼干、穿美援面粉袋内裤的小学生。国共进入冷战,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美军电台成天播送美国流行音乐。到了二叔的大学时代,仿美的年轻人纷纷冒出头。二叔在家,若看我呆在电视布袋戏或卡通里,准骂声没水平,然后正义凛然地把频道转奉给余光主持的《青春旋律》,等候张艾嘉、胡茵梦、苏芮出来美美地翻唱热门音乐。

当然,流行乐对念大学没帮助。能送二叔上大学,靠的是他兄嫂、我父母带着全家老小拼死拼活地种烟草。1970年代是美浓烟草经济的顶峰,产量占全台1/4。冬天一到,美浓平原乌绿一片,一两万人忙进忙出,几千栋烟楼日夜熏烤。烟草的产值远高于稻米,但劳动力需求大,工时又长,生产及销售受政府严控。父母那辈的烟农称烟业为“冤业”,无不希望孩子把书念好,将来坐横桌办公,拉拔全家脱开泥巴的沾黏。因此能考上大学的,最有资格享受家里的辛苦积累,况且他们还让家里在地方上这么有面子。

二叔是我家历来第一位大学生,受父亲及祖父疼爱,物质欲豁免于客家的省俭道德。想有电唱机跟上流行?好,去买。想载女同学缺摩托车?好,去牵。二叔那一辈的美浓大学生,是我镇历史上最紧跟现代流行的一群后生。他们疯电影、迷美国流行文化,成群结队游乐。当然,家里的农事仍得帮多帮少。于是交代完白天的分工,二叔他们弄来手提电唱机,架在秋收的晒谷场中央,大伙儿围着跳舞。熏烟叶的寒夜,二叔绝不一人掌火,随时都是一伙后生聚在烟楼,听着电台里的流行乐,把

偷来的鸡、摸来的狗，煮成下酒的宵夜。他们是我镇历史上仅有的纨绔子弟，烟草时代的宠儿。

二叔是我们这些土孩子眼中的文化英雄，他每年寒暑假回来是大事。若他兴致好，会召我们进土砖书房，用电唱机为大家播放最近买的唱片，讲解最新的流行观点。“你们听，那黑人嗓音，拉得多漂亮！”为了说明黑人音乐如何纠结灵魂，他会仰头眯眼、双手抓心。“还有那节奏，碰！碰！碰！”二叔讲着讲着，又唱又跳。我们这些土孩子眼瞪瞪，像在看特技表演。

可是，我们这种大耕作农家，怎有书房？祖堂以外的房间，吃饭睡觉、存放谷物是最高优先，哪还有什么写字房？若真肯读书，饭桌上、屋檐下就行啦！我出生那年，父亲的朋友福庆叔从台北带来一位叫 Myron L. Cohen（1937—）的犹太阿美仔。这位阿美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想研究中国大陆的客家农村，但受冷战阻碍，不得而入。他跑来台北，在“中央研究院”探询替代研究地点。福庆叔在那儿做行政，学术接待与他无涉，但一听到客家，耳朵自动伸长。

套用现在的话，福庆叔定被说成沙文主义者。他把 Cohen 拐下来的说辞不外乎“客家保存最多中国文化，而美浓又保存最多客家文化。”福庆叔跑来我家晓以大义，父亲重视读书人情谊，不理母亲啰唆，决定让 Cohen 住下来。

合院里刚好有一房人外迁。他们答谢母亲的生活接济，让我们使用留下的空房间。父亲把搬空后的厨房、客厅转做工具间与车库，安排 Cohen 住在他们的卧室，我们称为“上片间”的土砖房。

他在村子里穿梭，尖鼻卷发碧眼，操着怪腔怪调的客家话

进行田野工作，为劳累的农村生活增添趣妙。精通汉文的Cohen 为自己取了个“孔迈隆”的中文名，我们便称他做“孔先生”，隐约觉得他跟孔子一定扯得上关系。他研究我们村子，而村民加油添醋地交换他闹出的各种笑料，也称得上是人类学交换吧。

他留传的笑话大抵跟食物有关。譬如我们用来配稀饭的豆腐乳，第一次他是大块入嘴，害我们家的媳妇惊恐不已。早上珍贵的煎鸭蛋，他出手一挟便是完整一块！“那可是要分成四小块，而且只有老人家与要下田的人才能挟来吃的呀！”几十年后母亲谈起仍旧心疼。

孔先生在我家住了两年。读高中的二叔发现孔先生跟他一样崇拜肯尼迪，讨厌尼克松，骄傲地四处宣扬。念初中的小叔溜进上片间，抓着他问音标，从此对英文有了巨大的自信。孔先生离开后，房里留下一个新式衣橱，一把大同公司与美国“西屋”(Westinghouse)技术合作的电扇，以及版本众多的阿美仔记忆。至于他做的研究，得等到1990年代初我与妹妹参加社会运动，搞田野调查，并读了一些人类学、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后，才有办法理解。

但我家至此有了书房，爱漂亮的小姑第一顺位占用，她去高雄念高中后轮到二叔，然后是小叔、大姊、二姊及三姊。轮到尾巴的我与妹妹时，家族中十五岁以上青壮人口，除了各房长子长媳必须留下来种田、侍奉长辈外，全都离农离土。

书房里迭起两代人的文化层：各种学校制服、教科书，过时的洋装、大衣，过期的《时代》杂志、《今日世界》、《读者文摘》。衣橱里有一个抽屉，塞满了他们青春玩乐的郊游照片，

间杂着孔先生没带走的田野照片,最滑稽的是他参加村里婚庆时被新人请烟吃槟榔的景象。有时我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听唱片,翻着相片里那些来不及参加的盛会,心里泌出又黏又沉的什么。这种感觉既陌生又让人溺着舒服,正合宜听 Hank Williams(1923—1953)的《Your Cheatin' Heart》。

到了国中,我开始注意大姊带回家的东西。她是族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生,但老一辈的男尊女卑观念让父亲高兴不起来。母亲不服气,对祖母说:“我做生做死,供你的儿子读大学。现在我女儿考上,就算食饭配盐,我也要缴她读!”

祖父疼这位勤奋善办的闽南长媳,没有横加阻止。父亲交代他二弟,我二叔,好好照应小他四岁的侄女。二叔定期给大姊生活费,开启了我们家出外,一个拉一个的传统。二叔阔气,要她尽管带同学去希尔顿,他请吃饭,领她们见识真正的阿美仔舞会。

可大姊的思路有点是美式现代化的逆流。她念中国历史,有民族主义与古典文学情怀,不喜欢浮夸的阿美仔文化,更讨厌装洋卖弄。她也买唱片,但偏爱国乐、京剧、古典音乐与民谣。前三者对我没什么作用,但民谣则令我的品味系统打架。

大姊带回 1970 年代台湾民歌运动的第一批唱片,我隐约感觉远方有人同样听二叔听的那些音乐,但耳朵长出了刺。我读唱片附页的说明,他们说要唱自己的歌,但一时间我还没准备好听他们的歌。我知道我的耳朵生出了美国舌头,但我脚下踩不到新的基础;我感到慌乱。

杨弦唱余光中的诗,胡德夫用国语唱自己族里的歌,我心里尊敬。但他们的唱片一放,我的两只耳朵就开始辩论:右耳

说生涩,不好听,简直像艺术歌曲嘛!左耳说应该要支持,不能这样计较。在我早期的音乐聆听史里,大姊带回来的唱片既是窗口,又是疑问。

那些民歌唱片的内文提到美国民谣歌手 Bob Dylan 及 Joan Baez 对他们的影响,我猛然想起二叔的排行榜唱片里有他们几首歌。回头重听,果真在摇滚乐丛林里发现一片草原风景。大姊的唱片提醒了民谣在流行音乐中的重要性;听着听着,慢慢领会了一些个性差异:摇滚乐——像 Steppenwolf 的《Born to Be Wild》之类的,是在用力吼情绪、欲望,而民谣——像 Joan Baez 的《Donna Donna》,则是在说故事。

大姊从台北带回家的,还有几十本翻译的心理学、文学及哲学丛书,出自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大姊把它们放在书橱上最显目的中央位置,长长一列,正对着电唱机上的黑胶唱片。在离家念高中之前,我好几次拿下来跟它们对看,从没能读进其中任何一本。但那些书名,什么《自卑的超越》、《悲剧的诞生》、《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等等,却不断地召唤。我想我一定要上大学,读通那些东西。

二十几年后重提这段,大姊一脸歉然,说她也一样,从没弄懂。

我那被摇滚的青春

—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野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瘾药。淹过下巴，我始觉不对劲。

1980年初，我念高雄中学。第一年寒假，我跟随家里的读书人传统，回乡当帮农，分担烟事。报纸、电视新闻以及午间连续剧，整天通缉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谋者。城里的学生社团，尤其是高中女校的康乐队，纷纷被动员去医院慰劳那些号称被暴民打伤、砸伤的军警。学生在病床旁弹吉他，跟绑着绷带的阿兵哥合唱爱国歌曲：一幕幕军民同歌共泣的画面。是啊，才一年多前，美国这无情绝义的家伙，竟然弃我们而去。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们怎能不团结，纵容这些坏分子？

我路过了那件事。

年前,12月10日下午,雄中操场边突然放满镇暴车。从没见过这款场面:那些象征国家武力的机械铁青着脸,瞪着我们打排球。隆冬,五点多几分,球影已模糊,我只好骑脚踏车回宿舍。出校门不远,寻常的路线开始折腾。以中山路与大同路交口为圆心,铁蒺藜团团围住一大片区域。我沿着外缘绕路,远远看得到里面有人集结、演讲。好比气象新闻里的台风云层图——那发出激昂声音的地方,应该就是台风眼。

我的政治敏感度尚在稚幼阶段,不太能理解铁蒺藜与演讲的关系。但气氛急切倾斜,透露着不祥,引我回童年某晚,堂哥发仁在窗外压着声音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北上塘。“去北上塘干嘛?”我问他,那里很暗,没几根电线杆啊。“有凶杀案,要不要去啦?”一阵惊怖,空气通了电。大人一定反对的,但我放下铅笔。到了现场,根本进不去。屋外村民围了几圈,里面人影幢幢。村民的神经像是连通着,里面一有动静,他们就如芦苇般晃动。“发仁哥喔!我看不到哇。”他理都不理,探头张望一阵,随就钻了进去。

这次不用他带。我回家紧快洗澡、吃饭,然后骑车赶往台风眼。台风圈早已扩大好几倍,铁蒺藜外多了警察,挥着棍子赶人,我只好折回。第二天早上,路障撤了,我骑过前一晚的台风圈,眼前所见,像极了1977年,中度台风“赛洛玛”过境:安全岛上的栅栏被拔起,行道树被推倒,沿街的玻璃被砸破,地上有各式各样的碎物。升旗典礼上,教官大声谴责暴力事件,校长呼吁爱国。我呆呆地仰望,感觉他们在用力兜拢破洞的天空。

采完一季烟草,回到城里开学,街上空气很闷。想起猫王

Elvis Presley 两年多前过世,我还没好好听他的歌,几个国中同学都在疯他呢。买了猫王的纪念精选集,但怪了,以前听二叔留下的排行榜唱片还会专找他的歌,怎么现在放他早期的成名曲像《Heartbreak Hotel》、《Hound Dog》、《Jailhouse Rock》,老觉得做作、别扭,像是使劲在揣摩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

由于被殖民的童年,唱片行是少数我能与这城有所联系者。但逛几下便感挫败;唱片柜里的东西,远超过二叔大学毕业后留在家里的畅销歌选集。儿时养成的品味,也顶不住新东西的冲刺。我渴望更有系统的介绍,耳朵转向电台。午夜有个播放轻摇滚乐的节目,每晚十二点差十几秒,一个说故事大姐的声音就会缓缓地洒出:今——夜——星——辰,然后我便感觉天文台的屋顶慢慢张开,满天星星漏进来,无线电望远镜伸出,准备探听外层空间的密语。

那么畅销流行的音乐,我却听成密码,用以解读内心的私密!若干年后看到一篇故事,讲一位日本著名爵士乐评人在二战期间,每晚掩在棉被里偷听美军电台的爵士乐节目。80年代初,我方虽不与美国交战,但那些讲述着身体冲动与灵魂渴望的轻妙絮语从压抑的缝隙中湿湿地渗进来,随便一道凝视的光,就可使它们化显为彩虹。无线电送来 Simon & Garfunkel; 他们属于雾蒙蒙的冬天,清冷,世界闭嘴,一个人开窗张望,或孤独踱步。他们唱 I'm a Rock,我在脑子里剪辑,把曲子配给美丽岛事件翌晨的喑哑街道。

但只消一个学期便腻了那个节目;他们选放的音乐太轻、太软,搭不上十六七岁陡升的浮躁。高二下学期有个大发现:班上那些前几名、我以为天资聪颖又对课外知识有热忱的学